

# 1956年工资改革与顾颉刚“跳槽”

1956年6月,国务院第32次全体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》,基本确立了我国此后将近40年的工资制度,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著名史学家顾颉刚,也在这次工资改革中迎来了职业道路的转变。

## 很多作家选择行政级别

1956年的工资改革,建立了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等几大类分配制度,其中党政机关的干部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,把干部分为30个行政级;企业工人分为8个(个别工种为7个)技术等级;专业人员,如教师、科技人员、文艺工作者、医务工作者也都相应有了自己的等级系列。且各系列之间可以互相换算,如高教1级和文艺1级大致相当于行政8级;文艺7级大致相当于行政13级,等等。

实行工资制以后,作家可以在文艺级别与行政级别工资标准中自由选择。对于很多作家来说,如果他们选择文艺级别,就比选择行政级别的工资高一些。但他们(特别是党员作家)一般愿意选择行政级,放弃文艺级。理由是:选择行政级的政治待遇高些,可以按级别看文件、听报告,甚至决定能否阅读《参考消息》,等等。

比如赵树理的行政级别是10级,月薪218元;而他也可评到文艺2级,可拿月薪270元。赵树理却选择了行政级别,还主动放弃公费医疗和公务差旅费,每次下乡,他都是自己掏腰包。他觉得自己的行政级别已解决了政治待遇,自己又是有一些稿费、版税的人,不能再花国家的钱了。

但是,对于戏曲界的一些著名演员,他们在旧社会就是拿高份子的,解放后便仍是按老章程,给他们定了高工资,大大超过了文艺1级的标准。如,京剧演员马连良月薪1800元,张君秋月薪1500元;评剧院的小白玉霜和新凤霞月薪都是600元。地方戏曲剧团也类似,有的县评剧团的主演能拿到200元的高工资。

##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及顾颉刚

当时,政府对于旧有的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特别是“高级知识分子”实行“包下来”“养起来”的政策,即团结、利用、限制、改造(思想改造),并给予相应的生活安排。其中,史学家顾颉刚是典型代表人物。

1926年,33岁的顾颉刚出版其史学巨著《古史辨》(第一册,先后出版七册),轰动史林,《古史辨》的出版,标志着一个新的史学学派——古史辨派的诞生,顾颉刚也当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。

在顾颉刚“古史辨”的诸多论断中,影响最大的就是“禹是一条虫”的论断,顾颉刚怀疑盘古及三皇五帝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,并认为历史上并无大禹其人——禹是先由神,再人格化为人而来的。

1952年,在中央筹办中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,谈及各地知识分子的安置情况,上海市长陈毅讲到顾颉刚,说他在上海经济困难,不大顺心;随即毛泽东便提起“大禹是一条虫”之事。原来在1938年,毛泽东曾将一册《论持久战》寄赠顾颉刚。也许是由于毛泽



顾颉刚

东对历史情有独钟,故而知道有一位“考辨古史的顾颉刚”;也许是由于顾颉刚主持通俗读物编刊社进行抗日活动,才收到了毛泽东的赠书。

在1952年的这次会议上,正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,于是有了邀请顾颉刚到北京工作的提议。

对于顾颉刚来说,经过1952年在商界参加的“五反”运动以及在学界参加的“三反”、思想改造运动,唯一的触动是使他认识了自己所应处的阶级。顾颉刚在大学教书已超过30年,因此那时在学界加入了教育工会,他很高兴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;然而想到自己仍是上海的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,还站在资产阶级一边,这就形成脚踏两只船的局面,弄不好将会掉进水里。况且他名为大中国图书局总经理,应算“资方”,但实际不当权,只任编辑部的工作,又应算“劳方”。他急于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,便想离开文史出版界。

## “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”

1953年秋,中国科学院院部在北京开会,议决邀请顾颉刚到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顾颉刚得到通知时,当即应承下来,因为这不仅与他离开商界的愿望相符,也与他多年的治学愿望相符。那时夏衍曾对顾颉刚说:“北京有好些人希望你,说你这样的年纪,也不必学习(指参加政治学习)了。”这句话打动了顾颉刚的心。他说:“我以为到了北京之后,就可以照我预定的计划读书写作,不再参与社会活动,

趁我精力还够的时候干个十余年,还可以做出一一点真正的成绩来,不辜负我一世的心愿。”于是在这年12月初,顾颉刚接受了科学院的邀请。

当时,科学院方面问起顾颉刚在上海的收入情况,顾颉刚告曰文管会和书店加起来有旧币500万元(即新人民币500元)。不知为何,以后就误传为要求到京后工资为500万元,仿佛顾颉刚在勒索高价。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到此事,说:“中国有几个顾颉刚?他要500万就给他500万。”此事传到上海,顾颉刚觉得传言歪曲了自己的意思,就在1954年6月趁夫人到北京看宿舍之机,要她向科学院致意,说工资绝对按照科学院规定,决不搞特殊化。科学院方面答应了,定顾颉刚的工资为218元,这是当时的最高薪(1956年工资改革,调整到345元)。

顾颉刚怀着可以“专心治学”的期望,于1954年8月22日抵达北京,就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一级研究员。该所于此年正式成立,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。

初到北京,一切未上轨道。单是整理书籍上架,顾颉刚就忙了两个多月,尚未来得及分类。他一生爱好书籍,节衣缩食地购买,所积太多,此次搬家,上海、苏州两地藏书共装225箱,约9万册;科学院特为顾颉刚包了两节火车车厢,全部运到北京,又将顾颉刚寓所安排在干面胡同中国科学院宿舍,即清朝大学士李鸿藻府邸之正房,以便顾颉刚存放书籍。这所前廊后厦的高大屋宇有200平方米,面积实在不小,室中多置书柜,顾颉刚如在书城生活中。

顾颉刚非常感谢政府对自己的照顾,只是他的藏书仍不能全部容纳,后来不得已将大部头之书售出,如汲古阁《十七史》、湖北局《百子全书》、商务印书馆之影印《四库全书孤本初集》,都卖与中国书店。但卖书之事并没有影响顾颉刚对于政府和科学院的感激之情,他知道自己已得到格外照顾了。

据《知识分子与人民币时代》陈明远/著

## “俄罗斯货币”伏特加

随着苏联解体和恶性通货膨胀的飙升,一些商店开始拒绝接受卢布,只收美金、德国马克或者英镑。1993年,用美元标价商品的行为被禁止后,俄罗斯人开始寻求有稳定性和购买力的硬通货——伏特加。

莫斯科实验室的职员德米特里·史米德里克在1991年12月告诉记者:“如果你给修理工20卢布修理汽车或天花板,他可能会哈欠连连。但如果你能提供一瓶伏特加,那工作很快就会被完成。”

一开始,伏特加的供应出现短缺,部分原因是玻璃瓶生产链出现问题,以及与邻国白俄罗斯的酿酒厂发生贸易纠纷。但即使在供应正常化之后,伏特加仍支撑着转型中的经济。资金短缺的工厂用酒来换取原料,政府甚至允许一些公司用酒来缴税。

1998年,西伯利亚一个地区的

政府给8000名教师每人15瓶酒作为工资。最初的提议是用厕纸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伏特加,因为“伏特加是唯一可以自由出售或交换面包和其他食物的东西”。

这样的故事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,想说明俄罗斯人正身处经济崩溃与混乱之中。然而,实际情况是,伏特加易货这种做法已经持续了很多年。

俄罗斯人叙特金说,20世纪70年代,妻子奥尔加的祖母总是把伏特加放在手边。“有时是给帮忙从地窖搬煤的邻居倒一杯,有时是给修理铰链的朋友倒一杯。”她每个月“花”大约一瓶酒来享受这样的服务。叙特金说,酒精是完成小任务的首选报酬。因为“为别人的工作给一个卢布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羞辱,但是花同样的钱倒150克伏特加,客人会很高兴。”

据《国家人文历史》郭晔/文